



当代贸易保护主义评析

□ 王东京

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受其影响，近几年全球贸易增长明显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今年以来，美国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贸易战，目前正有不断升级、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上，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既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当代贸易保护主义是重商主义的翻版

重商主义是15—18世纪初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一种理论思潮。其主要观点：一是认为金银等贵金属才是一国必不可少的财富；二是强调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重商主义分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少进口、以保持和增加国内金银货币；晚期的重商主义则主张卖出限入，即多出口、少进口。显然，今天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正是历史上重商主义的翻版。

客观地讲，重商主义曾一度推动过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到18世纪中期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重商主义渐渐不合时宜，并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对重商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重商主义到底错在哪里？让我们看看亚当·斯密是怎样分析的。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是从分工下笔，指出分工可提高效率。他有个重要观点：认为产业分工是由绝对成本（优势）决定。举例说，有甲乙两个人，甲种粮的成本比乙低，织布的成本却比乙高；而乙呢，种粮的成本比甲高，织布的成本却比甲低。这样比较起来，甲的绝对优势是种粮，乙的绝对优势是织布。斯密说，只要按各自绝对优势分工，甲种粮乙织布，然后彼此用粮与布交换，双方皆可节省成本。

后来李嘉图对斯密的分析作了拓展，指出决定分工的不只是绝对成本，还有比较成本。不过那只是成本比较的参照不同。要提点的是，无论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讲分工皆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自由交换。若不能自由交换，即便存在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也不可能分工。还是举前面的例子，甲专种粮而乙专织布，但若甲不能用粮食换乙的布，不能互通有无，甲和乙是不可能形成分工的。

请注意，这例子暗含着一个重要推论：即商家生产商品是为了卖（满足别人的需求），而卖的目的则是为了买（满足自己的需求）。简言之，是“为买而卖”。因为对商家来讲，不卖就无法买，不买也就无需卖。这一点在早期物物交换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只是由于货币的出现，商家这种“为买而卖”的动机才渐渐被漠视了。

或许有人问，现实中很多商家卖了之后并没买，怎可说是“为买而

卖”呢？不能否认生活中确实是存在这种现象，有人卖后并没有马上买，而是将换来的货币存进了银行。不过，这现象也并未改变商家“为买而卖”的动机。商家选择储蓄是为了获利息，储蓄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更多地买。也就是说，储蓄只是购买的延迟而非购买的放弃。

以上分析的是国内贸易。其实，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道理一样，一个国家出口也是为了进口。而且这推断不会错，不然一个国家若不想进口，那么它出口的目的是什么呢？经济学讲参与国际贸易可享受国际分工的利益，是说出口自己生产率高的产品而进口对方生产率高的产品可以双赢。若你只出口不进口，别人享受了你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你却不去分享他国高生产率的利益岂不是赔本赚吆喝？

由此看来，目前美国发动贸易战一方面用高关税壁垒阻止中国商品进口，另一方面又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出口，此举无疑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理论上，是重商主义在21世纪死灰复燃；从实际效果看，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动。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可如果一意孤行地限制贸易自由，我们完全可以质疑今天美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高关税并不能保护国内产业

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主要理由，是高关税可以限制进口，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事实上，一国的进口是他国的出口，而一国的出口则是他国的进口。古语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国家若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出口自由，那么你就不能限制进口而妨碍别人的出口自由。

特朗普自然懂得这个道理，可美国为何要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呢？前面说过，贸易保护主义源自于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然而时过境迁，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金银已与货币脱钩，没有人再相信“唯有金银是财富”的神话。问题就在这里，既然人们不再迷信金银，可至今为何还有人有关关税推崇备至？甚至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乐此不疲？

明眼人不难看出，特朗普这次发动贸易战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航天航空、通信技术、先进机械等产业，其目的昭然若揭，旨在打击“中国制造2025”。其实早在10年前，美国就对中国轮胎进口开征过“特保关税”，并声称是迫于美国钢铁工业协会的压力。奇哉怪哉，进口中国轮胎与美国钢铁工业有何相干？再说，美国本来就需要进口轮胎，不从中国进口也得从别的国家进口。从别国进口而不从中国进口怎么就能保护美国就业呢？

显然，所谓“保护国内产业”不过是特朗普的借口。从短期看，高关税确实可限制进口，保护国内企业或就业；但长远看，却不过是在让本国消费者补贴生产者。比如中国生产的

皮鞋出口到美国，若每双售价100美元，而美国生产的皮鞋每双售价为150美元。此时美国的皮鞋生产企业就可能去游说政府，要求多征进口皮鞋50美元的关税，理由是关税不提高，国内皮鞋企业被挤垮，工人会失业。

骤然听，此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如果从美国消费者角度看，结论却不尽然。比如政府不多征50美元关税，消费者花100美元便可买一双皮鞋；政府加征关税后，却需150美元才能买到，这样的结果必然会使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实际生活水平降低。可见，提高关税损害的是美国消费者利益，其实质是让消费者拿钱维持皮鞋企业的生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从机会成本看，消费者花钱支持皮鞋企业的工人就业，其机会成本是放弃购买其他企业商品可能创造的就业。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消费者不多花50美元购买皮鞋，而用这50美元去买衬衣，衬衣厂的销售就会扩大，就业也会增加。就扩大就业而言，两者并无分别，只是人们重视看得见的就业而忽视了看不见的就业而已。

事实确实如此，站在国家层面看，增加皮鞋企业的就业与增加衬衣企业的就业是一回事。区别在于，提高皮鞋的进口关税，在保护皮鞋企业的同时，其他企业的发展却会受到限制。问题在于，一定时期的资源是有限的，而那些需要关税保护的企业，恰恰是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而低效率的企业被保护，资源就会向这类企业流动，这不仅对高生产率企业不公平，而且还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

国际收支平衡并不等于双边贸易平衡

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另一理由是实现美中贸易再平衡。不能否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有逆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有顺差，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吃了亏或者中国占了便宜。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说明美国从中国买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商品；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说明中国未从美国买到所需要的商品，而只是将自己的商品换成了美元。

很明显，与“保护国内产业”的论调一样，“实现贸易再平衡”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另一个借口。不错，一个国家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可经济学同时也讲得清楚：国际收支平衡不等于贸易平衡；贸易平衡也不等于两个国家的贸易要双边平衡。美国打出“实现贸易再平衡”旗号，无非是掩人耳目、混淆视听，说到底还是为自己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开脱。

为何说国际收支平衡不等于贸易平衡？经济学的解释是，国际收支包括贸易往来与资本流动两个项目，若分别看贸易项目或资本项目，它们皆有可能不平衡，但两个项目综合起来看一定是平衡的。道理简单，当中国把服装卖到美国后，美国付给中国

美元，可这笔美元却留在了美国并未进入中国。这样中国的出口虽然有所增加，可资本项目却相应减少了；而美国在进口增加的同时，资本项目也有相应增加。这样从整体看，国际收支仍保持平衡。

进一步分析，中国用商品出口换的美元若不用于进口，对中国来说美元储备就是一个数字。中国要想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就必须加大进口国外商品。随着进口增加，中国的贸易项目最终也会平衡。现在要研究的是，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该如何平衡？是应该双边平衡还是多边平衡？

美国提出的主张是，美中贸易要双边平衡。稍懂经济学的人知道，此主张是强人所难，不仅理论上站不住，现实中也行不通。人类进入到21世纪，产业分工已经全球化，如果两个国家处于产业分工的上下游，双边贸易不可能平衡也无需平衡。假定有甲、乙、丙三个国家分别生产棉花、纱锭、布匹，甲将棉花卖给乙却不购买纱锭，那么甲是顺差，乙是逆差；乙将纱锭卖给丙而不购买布匹，则乙是顺差，丙是逆差；丙将布匹卖给甲却不购买棉花，于是丙是顺差，甲是逆差。若仅从两个国家看，贸易皆不平衡，可从多边贸易看却又是平衡的。

懂得了上述道理，我们就不难明白美国对中国贸易为何会出现逆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处于国际分工的最高端，而中国处于国际分工的相对底端；同时，也与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有关。在今天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只要印出美元就可在全球采购商品；而中国要进口美国商品，必须先出口商品换回美元，相对而言，美国当然容易出现逆差。有数据显示，美国不仅对中国有逆差，对全球100多个国家也有逆差。

说“实现贸易再平衡”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借口，还有一个事实可以佐证。倘若美国真想实现美中贸易平衡，对美国来说其实易如反掌。近一年来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希望扩大进口，可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却始终不肯卖给中国。自己的商品不卖怎会不出现逆差？由此可以断定，美国提出所谓“贸易再平衡”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目的是要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

回溯二战以来的历史，美国称霸世界靠的就是军事霸权与美元霸权。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元挑战美元，1985年美国却用一纸“广场协议”将日元击败了；1999年欧盟19国推出欧元，2002年进入流通，结果到2009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至今欧元一蹶不振。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提速，于是美国又把中国当成了对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实质是维持美元霸权和美国优先的一种战略。



竞争中性原则：保护竞争而不保护竞争者

对待国有企业。

对待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原则，是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在其《竞争原则协定》《联邦竞争中立政策声明》中明确的概念，即公共部门的商业行为不得因其国家所有权的特殊性而享受私人部门不能享受的竞争优势，目的在于确保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的平等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竞争中性原则的含义进一步扩展，指在国企与非国企并存的情况下，确保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不给国有企业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其内涵包括：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

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等八方面的标准。

因此，竞争中性原则的要义是，政府采取的所有行动，对国企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的影响都应该是中性的；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不给任何实际的或潜在的市场参与者尤其是国企带来任何“不当的竞争优势”。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永远是保持市场肌体健康的“基础设施”。竞争中性原则旨在保护整个竞争的过程以及竞争的市场，而非不是为了保护某一个竞争者。

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为公平、公正市场发育成长创造环境，使市场主体各归其位、

优胜劣汰，实现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践行竞争中性原则与当前国企改革的目标相一致，就是为了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如同“一匹马如果没有另一匹马紧紧追赶着并要超过它，就不会疾驰飞奔”。确立竞争中性原则的目的，就在于通过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来确保市场的公平和公正，由此保证价格等一系列市场信号的准确和畅通，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激活每一个市场因子，并为经济转型提供“源头活水”。

创造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现实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了重要平台。

重申“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一我们党的根本政治定位，明确了统筹推进强大国家和伟大政党的总保障，展现了21世纪“中国特色”的本质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

市场监管的要义在于管“活”管“优”市场。李克强总理在近日考察新组建的市场监管总局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重要职责是“把市场管活而不是管死，管优而不是管乱”，指明了新时代市场监管方向，诠释了市场监管与市场竞争之间辩证关系。营造公平、自由、有序市场竞争环境是市场监管重要使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活”管“优”才是政府作用发挥的关键。

管“活”管“优”市场是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国内外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发展质量往往与市场竞争相伴相随，经济发展质量比较好的国家通常也是市场竞争机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市场竞争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最根本要素，只有依靠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才能有持续推进的内生动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带来的质量红利才能持续得到释放。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管“活”管“优”市场主要体现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公平、自由、有序市场竞争环境。因此，市场监管部门以促进市场竞争为立足点，最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最大程度优化资源配置，以夯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管“活”管“优”市场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长期以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市场监管乱象时有发生，从西安地铁电缆事件，到拼多多事件，再到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无不考验着市场监管部门在管“活”管“优”市场、规避管“死”管“乱”市场方面的监管能力，彰显了营造公平、自由、有序市场竞争环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迫切性。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是我国处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关口，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这一重要关口市场监管工作的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实现竞争公平有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市场监管部门需要践行好、体现好这一要求，履行管“活”管“优”市场的监管职责。

管“活”管“优”市场根本在于促进和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公平竞争”是市场竞争的“灵魂”，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市场竞争的公平程度与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只有实现公平的竞争，才能最大程度增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最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管“活”管“优”市场需要将“公平”作为市场监管的基本价值取向，将“实现公平竞争”贯穿于市场监管各领域各环节。要以贯彻落实《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契机，健全完善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政策体系，以实现竞争规则公平为核心，以实现竞争权利公平、竞争机会公平为重点，将促进和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作为管“活”管“优”市场的根本。

管“活”管“优”市场基础在于促进和保护市场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制度是最佳的经济调节机制。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没有人为了的障碍，是公平竞争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直接体现。只有促进和保护自由竞争，生产要素才能够自由流动，价格的调节作用才能得到有效发挥，经济才能保持持续创新力和竞争力。管“活”管“优”市场需要将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作为市场监管的重要方面，更大力度推进“简政放权”。要以贯彻落实《反垄断法》为契机，加强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和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等垄断行为的政府规制，强化反垄断政策在经济高

管「活」管「优」促进市场竞争

□ 王 山

质量发展政策体系的基础地位，推进反垄断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同融合，为市场自由竞争创造优良的政策环境。

管“活”管“优”市场前提在于促进和保护市场有序竞争。有序竞争与公平竞争、自由竞争之间存在相互联系、互为发展的辩证关系，要管“活”管“优”市场，不仅要聚焦实公平竞争和自由竞争，也要聚焦促进和保护有序竞争。有序竞争能有效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增强经济发展优势，然而，经济发展实践告诉我们，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是市场竞争的天然属性，市场竞争自身容易引起竞争无序。因此，需要发挥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市场有序竞争的作用。要以强化市场竞争执法为抓手，增强竞争法律法规威慑力，构建以强化竞争执法人员能力提升为基础、以强化竞争执法创新为支撑、以强化竞争违法成本提升为重点，以强化竞争文化培育为基础的全链条式竞争执法体系，切实保障市场有序竞争。

总之，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市场监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把促进和保护市场竞争摆在市场监管的突出位置，将促进和保护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履行管“活”管“优”职责的关键抓手。



（上接1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人民奋斗和担当，既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完整继承，又为其赋予了强烈的时代针对性和与时俱进内涵，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21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主题，明确了统筹建设强大国家和伟大政党的总任务，展现了21世纪“中国

特色”的文明格局。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对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秩序的深刻变动，尤其是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与复杂全球化潮流正面相遇的历史境遇，习近平总书记以文明尊重为胸怀和抱负，创造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文化追求和意义指向作出深刻阐发，为21世纪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贡献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显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而深远的世界历史关怀。展开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深入揭示复杂全球化时代人类发展的“地球村”现实，以文明尊重的理念深刻阐发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坚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示范了中国路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一系列重要阐述，既对我们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地位和功能作出了根本定位，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势进行了深刻的时代阐发。在当代中国，“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及其所阐明的“党是领导一切的”地位不是自封的，是由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的，是由党的奋斗历程和历史成就决定的，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而新时代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

【执笔：冯鹏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